

目 录

天津建党八十年图片观览 (1)

第一篇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浴血奋斗

- 一、天津早期党团组织的建设及党领导的
革命活动 (1)
- 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3)
- 三、白色恐怖下的顽强抗争 (29)
- 四、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38)

第二篇 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探索

- 一、新政权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57)
- 二、革放鼎新的时代 (71)
- 三、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
建设的辉煌 (85)
- 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 (100)

第三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 一、伟大的历史转折 (115)

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124)
三、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138)
四、加强科技进步.....	(149)

第四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一、加快发展战略的制定.....	(163)
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72)
三、改革开放的大步推进.....	(185)
四、向着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迈进.....	(220)
附录一：天津市历任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	(235)
附录二：建国以来天津市 GDP 及增长表	(237)
附录三：优秀表彰名单.....	(239)
后记	(247)

第一篇：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 浴血奋斗

一、天津早期党团组织的建设及党 领导的革命活动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是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的汇合处和入海口，素有“九河下梢”、“河海要冲”之称。天津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北京，是我国北方的大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水流纵横，河海相通，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从古代起，天津人民的祖先就劳动繁衍在这块土地上。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天津的战略地位日趋显现，金、元王朝在这里设有直沽寨和海津镇，驻有重兵戍守。1404年，明成祖朱棣在这里设卫筑城，取名天津，从此开始了它的城市历史，至今已近六百年。

明朝在这里设卫筑城后，天津开始成为我国北方的军事重地，政治、经济、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至明代后期，人口已达5万，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著名的封建主义城市。清朝建都北京后，天津的政治、经济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军事地位也更加重要，成为北京的重要门户。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多次攻占天津大沽口。1860年，清廷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天津增开为商埠。从此，揭开了天津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的历史。

《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纷纷拥入天津，强占土地，设立租界，建立国中之国，做为侵略和掠夺我国的桥头堡。从《北京条约》签订后至19世纪末的40年间，西方殖民主义者先后在天津海河两岸建立英、法、美、日、德、俄、意、奥、比等9国租界，占地2.2万亩，相当于天津旧城区面积的8.5倍。他们在租界倾销鸦片，毒害我国人民；开洋行、设工厂，掠夺我国资源，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进行商品生产；垄断天津港口和进出口贸易，利用洋行、银行、轮船公司、保险公司、公证行等机构，控制天津及其腹地华北、东北、西北等的经济；利用租界所军有的治外法权，庇护为非作歹和已经下台的封建军阀、政客、官僚等逃避制裁。天津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冒险家、中国封建军阀、官僚、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乐园，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

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天津人民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著名的就有1859年大沽人民支援炮台守军抵抗英、法联军入侵的斗争；1870年天津人民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宗教迫害、火烧望海楼的斗争；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1905年由天津

发起并波及全国的抵制美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1911年天津革命党人举行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1916年天津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强占老西开的斗争等等。这些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在天津的统治基础，但由于领导这些斗争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导，斗争或是最后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联合绞杀，或是虽取得一定的胜利但没有改变天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性质。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身上。

天津工人阶级，首先是伴随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天津办工厂、开展贸易而产生的。据当时在天津建立的卷烟厂、煤气公司、印字馆、大沽驳船公司和9家打包厂统计，工人人数约1300人。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大搞洋务运动期间，又在天津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工人阶级队伍随之扩大。至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争前夕，天津近代工人总数在5000人以上。这是天津第一代产业工人。天津第一代工人阶级，大多数由破产农民、渔民、手工业者和士兵转化而来，部分是从南方招雇而来的技术工人。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毫无政治权利，生活极为悲惨。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随时有工伤死亡的危险，所得工资仅能维持个人最低生活，还经常受到工头的打骂和处罚，甚至私刑拷打。

天津工人阶级也是随着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不断壮大的。天津民族资产阶级是伴随西方殖民主义者

入侵而产生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后，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渐渐发展起来。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一些封建官僚、洋行买办和大商人逐渐投资兴办近代工厂。从1902年到1913年10年间，民族资本在天津新建的工厂，其资本在万元以上的约有32家，涉及矿业、化工、烟草、玻璃、火柴、造纸、织呢、印染、啤酒、榨油等几十个行业，并出现了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等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大型企业。这一时期，民族资本经营的铸铁和机器制造业在三条石地区也逐渐发展起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一时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和压迫，天津民族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特别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主的轻工业发展更为迅速。1922年，天津已有裕元、华新、恒源、北洋、裕大、宝成等6家较大规模的纱厂，并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棉纺城市。无产阶级由于与近代工业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近代工业大生产的训练和阶级地位，使他们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在政治上具有远大前途，为中国共产党产生准备了阶级基础。

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李大钊的热情歌颂与尖锐批评时政，给天津知识青年以极大鼓舞。在天津，开展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是南开学校、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和法政专门学校。南开学校的周恩来和北洋大学的张太雷是天津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周恩来主编了《敬业》、

《校风》等刊物，不但自己发表大量促进思想文化革命的文章，而且要求刊物发表文章“注重思想，抒写个人心得，藉以唤起世界潮流，融贯古今学说，以求思想之进步”，而“颂圣、说大话及神仙鬼怪文章，绝不可登”。听到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后，周恩来转而集中精力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自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他兴奋地说：“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在北洋大学，张太雷一面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一面学习和翻译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1919年2月，张太雷在天津发起组织进步团体“社会改造社”。这一切预示着一个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天津的革命斗争将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天津大中学校学生立即纷纷行动起来，通过集会、演讲、通电等方式，给予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以声援。5月6、7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代表连续开会，决定成立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14日，天津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开会，宣布正式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25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学生爱国团体建立后，组织学生走上社会，向群众广泛开展爱国讲演，控诉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在学生爱国行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天津各界群众也纷纷行动起来，组织爱国团体，开展爱国活动。如，以工人为主体组织的“劳力联合会”，以商店店员为主体组织的“救国十人团”，以公教人员为主体组织的“公救救国团”等等，分别向各自联系的对象开

展救国宣传和抵制日货的活动，爱国运动在全市开展起来。6月上旬，为营救被军阀政府逮捕的北京学生，配合上海工人、学生和商界的“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天津爱国学生和天津人民多次向直隶省公署和北洋军阀政府开展请愿斗争，并取得重要胜利。6月18日，天津工商界、教育界、文化界和各爱国团体联合成立“天津各界联合会”，将天津各界爱国团体联成一体，把反帝救国斗争推向高潮。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为了爱国斗争的需要，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的关心和直接指导下，天津的一些先进分子于1919年9月先后成立了觉悟社和新生社。它们创立报刊，不断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阴谋，介绍世界革命新思潮；邀请李大钊和其他进步学者到天津演讲，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不断提高政治觉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日益结合，教育和培育了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天津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

1920年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天津的先进分子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天津是我国北方的工商业中心和港口城市，毗邻北京，市内租界林立，其中的旧俄租界为共产党人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五四”运动前，俄国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就曾在天津俄租界

与中国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进行接触，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问题，开展革命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张太雷担任了翻译和记者工作，并经过他翻译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献。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遣的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这个过程中，张太雷一直陪同作翻译工作。他不仅与李大钊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经常往来于京津沪之间沟通各地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专门从事革命活动，推动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10月，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张太雷参加，成为天津最早的共产党员。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张太雷即受李大钊委托在天津开展建党、建团工作。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工人运动，在天津和唐山发展了一些党员。党成立初期，由于急需开辟工作，干部又十分缺乏，天津的党员大部分被党派往外地，较长时间留在天津坚持工作的不多。因此在1923年底以前，天津没有建立独立的地方党组织机构，党小组直接受北京党组织领导，党员和团员混编一起开展工作。在建立团组织方面，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不久，张太雷就创建了天津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继上海之后，在我国建立的第二个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制定了明确的章程，确定自己的宗旨是“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主要任务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宣传和组织工人开展政治斗争；团组织建有比较完整的组织机构，有类似委员会的书记处，设有“工人状况

调查委员会”和“社会主义研究部”;团员要开展定期的组织活动和学习活动,吸收和开除团员都要遵循明确的规定。这是我国早期建团活动中比较明确而完备的章程,在全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曾被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誉为“比较彻底的中国青年组织的楷模”。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即出版了小型日刊《劳报》,报导工人运动消息,研究工人问题,向工人开展革命宣传;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印成小册子,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工人运动;打破天津地区的范围,发挥党组织作用,经常派员深入唐山、长辛店、南口以及京奉、京汉、津浦铁路沿线工人集中的地区,调查工人状况,研究建立工人组织,开展建党工作,成为北方早期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上海、北京等地共产党组织逐步诞生的过程中,天津以觉悟社为代表的革命团体也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1920年8月,在觉悟社成立一周年召开的年会上,周恩来在总结觉悟社一年来斗争经验时报出了联合、团结和改造全国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挽救国家危亡的主张,得到会员的一致赞同。会后,社员们集体赴北京,请求辛大钊给予指导与支持。李大钊对于觉悟社的主张给予了热情赞许和大力支持,并为他们邀请在京的“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四个著名的青年团体共商联合问题。8月16日,觉悟社在陶然亭与北京四团体举行座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五团体

决定合组一个“改造联合”，制订了《改造联合的宣言》和《约章》。宣言提出，集合在“改造”的旗帜之下，本着团结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到民间去，进行“宣传事业之联络”，“社会实况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切切实作点事，实行社会之改造。这次座谈和五团体的联合，极大提高了觉悟社社员的政治觉悟，开阔了思想境界，坚定了革命意志。一些社员当即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投入了劳工、学生、妇女运动和我国早期的建党建团活动。同年10月，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天津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天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基础，其主要成员成为后来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人和重要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于1921年11月决定对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一次整顿，使之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作为党的助手发挥战斗作用。1922年2月，在中共北京地委的指导下，经过组织整顿，天津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设有书记、出版、宣传三个部。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加强团组织建设、大力开展团的活动的要求。会后，在北京团地委的指导下，将天津团地委改组为团的特支。之后，团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至1924年2月，天津团员的数量已达45人，团的活动也活跃起来。

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

斗争。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至1924年间天津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女星社等20多个宣传新思想的团体,出版十几种报刊,发表了李大钊、周恩来等数十人撰写的近百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广泛性。特别是1923年天津团组织成立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氏学会”,在《新民意报》副刊创办了《明日》旬刊,公开宣布其任务是“唯一专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改造社会的良剂”,“我们要本着马克思的精神来解决社会问题”。学会还筹办了“马氏通讯图书馆”,专门出借马克思主义书刊,使更多的人成为“马氏信徒”。

发展工人运动。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劳报》,主要宣传对象是天津、唐山等地的工人群众,启发工人觉悟,开展工人运动。还创办了工余补习学校,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教育和提高,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据补校成立后一年的统计,天津工人举行的重大罢工斗争就达十余次,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此,当时上海《民国日报》称补校是“天津劳工运动的一道曙光”。1922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建立,天津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利用军阀政府召开“制宪国会”的时机,提出了劳动立法四原则和劳动法大纲,号召全国工人为实现劳动立法而斗争。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号召,天津支部在工人中广泛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致电国会参众两院,要求迅速通过和实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制订的劳动法大纲。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全线工人举行总罢工，天津西沽机车厂工人闻讯也举行了3天罢工以示声援。京奉、津浦铁路工人还派代表来天津，与天津铁路工人一起研究对策。“二七”惨案发生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及时在《新民意报》揭露了惨案真相，发动天津工人声讨军阀吴佩孚的罪行，抨击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

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五·三”运动中，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人以实际行动冲破封建主义束缚，争取男女平等，把妇女解放运动同反帝反封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天津妇女解放运动的前驱。1922年4月，邓颖超等发起组织女权请愿团，向国会进行请愿，争取女子的参政权和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1923年春，邓颖超集合妇女运动的少数先进分子成立“女星社”，确定“女星社”的宗旨是“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女星社”成立后，在《新民意报》副刊创办了《女星》旬刊，宣传妇女解放，抨击残害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和社会恶势力，支持和声援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与社会各种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帝反封的斗争。与此同时，“女星社”还创办了“女星”补习学校，培养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队”。1923年秋，为发展天津的妇女解放运动，刘清扬、邓颖超等人一起创办了《妇女日援》，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把妇女解放运动同实行社会变革紧密结合起来，成为被压迫妇女的革命号角，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影响。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向警予对《女星》旬刊和《妇女日报》给予高度评价，称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

1924年，为适应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在天津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国民党“一大”闭幕后，李大钊即指示于方舟、江浩等返津筹建中共天津地方党的组织。3月，中共天津党小组成立，直属中共北京区委领导。6月14日，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党团组织彻底分开，并由党团组织共同组成一个“审查委员会”，通过审查，将超龄团员尽量转为中共党员。通过审查，委员会决定将邓颖超等9名超龄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使天津中共党员数量接近20人。天津已具备建立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条件。

7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北京区要领导人赵世炎主持下，天津全体共产党员在法租界24号路普爱里34号举行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共天津地委正式成立。从此，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更加有力的领导核心。

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为发展天津的革命形势，作出了关于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决议。中心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工人队伍，开展工人运动，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

为加强革命统一战线工作，1924年2月底，天津组建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天津的全体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都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组织，许多党、团

员还担任了国民党省、市党部的领导工作。共产党员直接参加和领导北方国民党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天津革命形势的发展。

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为深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根据天津处于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直接统治之下、党的力量比较小、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实际情况，中共天津地委决定以比较集中的纺织、码头搬运、印刷等行业为工作重点，教育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采取举办平民学校的方式开展工作。党团员通过与工人群众的接触，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和革命道理，启发工人政治觉悟，发展党团员，壮大党团组织，发起组织工会，开展群众运动。

举办平民学校是对工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成功范例。平民学校在教识文字时，紧密结合实际，用生动的语言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例如，讲到“工人”二字时，说这个“工”字，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中间一竖，顶天立地，工和人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天”字，天下大多数的东西都是工人制造的。再加上广大农民种地打粮，人们才能生活下去。工人、农民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应该是国家的主人。可是，现在内有资本家、地主、军阀的压迫剥削，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压榨，这好比上有石头压，下有石头卡，工人们在当中受苦受罪。工人生活所以这么苦，未能摆脱悲惨处境，从工人自身来说，是我们

自己还没有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课堂讲课还向工人们介绍俄国工人、农民在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沙皇统治夺得十月革命胜利、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当家做主、生活逐步改善的情况,使工人很受鼓舞。经过教育,参加学习的工人从苦闷和迷惘中看到了曙光,懂得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同反动势力作斗争,才能争得解放。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要求学习的工人越来越多,平民学校在工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党教育工人、组织工人的重要阵地。

通过教育和培养,天津宝成、裕元纱厂的一些工人骨干率先加入党组织。1925年4月,宝成纱厂党支部成立,这是天津工厂企业中的第一个党支部。与此同时,组织工会的工作也逐步展开。为使工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发展工会会员采取了“三三制”的办法,即一个会员发展三个会员,再由这些会员分途再各发展三个,依次类推,逐步扩展开来。1925年4月,宝成纱厂工会成立,这是天津第一个纱厂工会。此后,其他纱厂和码头、印刷、铁路、地毯、扎彩油漆、雕刻、绱鞋等行业的工会组织也陆续建立起来。在教育组织工人队伍的同时,天津地委按照1925年3月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精神,还派出一部分共产党员到农村开展工作,并将玉田县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重点县。随后,在小学教师中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创建了国民党玉田县党部,进而发展一批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天津地委的群众工作,

特别是对工人的有效教育与组织为大革命高潮在天津兴起奠定了阶级基础。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支持孙中山北上，要求各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活动。天津地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开展迎接孙中山北上，掀起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委内容的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

还在孙中山抵达天津之前，中共天津地委就于11月24日召集了有41个团体参加的迎孙筹备会，从事起草传单、与孙中山接洽等项准备工作。27日，又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天津市党部名义发出宣传车，分别在围城马路、估衣街、各租界特别区行进，车上插着“欢迎首创民国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抵津”、“打倒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门旗，大量散发传单，为迎接孙中山到津营造舆论氛围。12月1日，天津国民党市党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讨论对孙中山北上的意见和准备欢迎孙中山事宜，决定将全体党员分别组织为维持队和宣传队，下分若干组，便于组织、宣传群众。共产党员也以国民党员身份进行活动。12月4日，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等一行到达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中共天津地委动员和组织了50多个团体的工人、学生、市民数万人，打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旗子前往欢迎。6日，中共天津地委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市党部的名义教发传单，要求孙中山除“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宣传政纲外，还应实施“解散国会”、“撤销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和